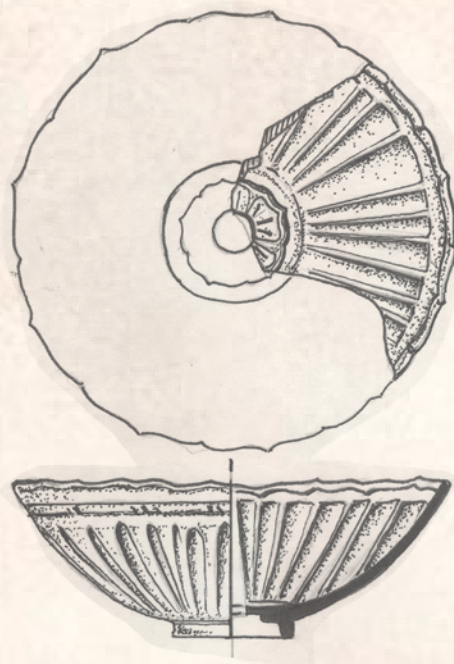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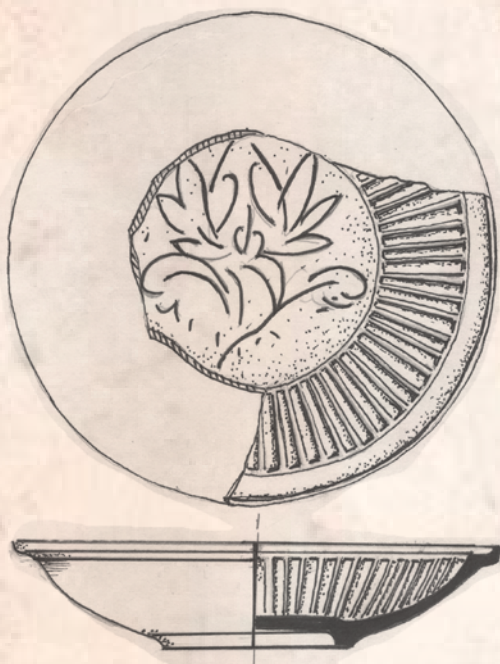


塔里克·多斯季耶夫  
历史学博士

# 青瓷——中世纪与中国贸易关系的见证

杰尔宾特考古发掘的青瓷餐具碎片 (M.S.哈吉耶夫、L.智贤)



**高**加索地区位于欧洲和亚洲的交界处，里海和黑海之间，地理位置得天独厚。阿塞拜疆在历史上一直是南高加索的重要地区之一。在这里，在亚洲和欧洲历史道路的十字路口，城市及城市文化密集地出现和发展。阿塞拜疆的各座城市都在丝绸之路的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丝绸之路作为人类文明最伟大的成就，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6世纪，在东西方

人民经济和文化联系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条贸易之路从古代中国的首都出发，途经东突厥斯坦、中亚、里海平原、高加索、西亚到地中海沿岸，全长12000多公里（《丝绸之路上的阿塞拜疆：2020年，第6页》）。“伟大的丝绸之路”一词是由德国学者李希霍芬引入历史学科的。1875年，在于柏林出版的五卷本著作《中国》的第一卷中，李希霍芬首次将“塞德斯坦”，即连接广阔的欧亚大



碗,甚至加热用的器皿、盆、罐、灯具和所有其他家庭用具,都是来自中国的瓷器”(比鲁尼:1963年,第212页)。

在阿塞拜疆中世纪遗址的考古发掘中所发现的青瓷,是阿塞拜疆与中国丝绸之路直接或间接贸易联系的物证。青瓷是中国的瓷器,

#### 古利斯坦要塞(沙马赫)的青瓷盘碎片

上面覆盖着各种深浅不一的浅蓝绿色釉料。据研究表明,这种瓷器一开始是模仿那些由珍贵玉石制成的器皿而出现的。玉石在中国艺术发展过程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中国文化赋予了玉石特殊的属性和象征意义(<http://www.synologia.ru>),最初玉石被赋予了查验和中和有毒物质的能力(<http://www.history-illustrated.ru>)。这种玉石最初是中国从东突厥斯坦-和田和叶尔羌进口的。

关于“青瓷”一词的起源,有几种假设。第一种假设是这个词起源于17世纪的法国,来源于典雅田园小说《义神星》里那个总是用淡绿色的丝带装饰自己衣服的主人公牧民切拉东(Céladon)的名字。另一个假设是将该词与萨拉丁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原因是萨拉丁作为埃及、叙利亚、苏丹和阿尤布王朝的创始人,在1171年将近40件青瓷制品送给了大马士革的埃米尔努拉丁。第三种假设将该词归因于梵语中分别表示“石头”和“绿色”的词语sila和dhara(库兹米娜:2021年,第33-34页)。

在中国浙江省南部的龙泉县有一个重要的青瓷生产基地(阿比洛娃:1956年,第56-57页;波卢博亚里诺娃:2003年,第155页;科瓦利:2010年,第134页),青瓷的原始中文名称“龙泉青瓷”也正是来源于该地区的名称。在穆斯林东部,这些陶瓷制品被称为马达班尼,是以缅甸的马达班港口命

名的,因为它们主要是由穆斯林商人的船只从马达班港口那里带来的(杰南斯:1967年,第72页;科瓦利:2010年,第134页)。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专家仔细研究了这种瓷器的古老烧制技艺和生

产技术后,在龙泉工厂制作出了13世

纪青瓷的精确复制品。

龙泉青瓷是世界

上唯一被列入

《人类非

物质文

化遗产

名录》

的陶瓷

艺术品。

在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保

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政府间委员会第四届会议

(2009年)上,龙泉青瓷的传统烧制技艺被列入上述名录(<http://www.zhengongfu.org>)。

就所检测到的化学成分而言,中世纪的青瓷与白瓷没有区别(科瓦利:2010年,第135页)。中国青瓷的最佳研究样本来自于宋朝(970-1279)和明朝(1368-1644),而元朝(1279-1368)中期所产瓷器则普遍被认为价值较低且艺术性较差(奎费尔德:1940年,第12页;哈吉耶夫、智贤:2012年,第55页)。

在阿塞拜疆的杰尔宾特、沙马赫、沙布兰、巴库、本达万、占贾、贝拉甘、盖贝莱等中世纪遗址中发现的青瓷餐具在塞尔柱、蒙古和后蒙古时期的记载中均有显示。在盖贝莱遗址中发现的青瓷盘,下面连接着圆形的托盘,托盘边缘向内突出,青瓷盘内壁装饰有凹槽,覆盖着浅绿色的釉面。

在塞尔柱时期杰尔宾特遗址中发现的青瓷盘中,有两块带有浅色釉下雕刻和浮雕的盘子碎片格外引人注目。其中一个常见的青瓷盘样式,它



的形状是圆的,盘口很浅,边缘低,边缘处有一个几乎不可见的凸起,同时下方连接着一个低而圆的托盘(图1)。盘子的表面覆盖着特有的淡绿色优质玻璃釉,宛若玉石。盘子上布满了细细的裂纹,容器的内外壁光滑,内部有波纹,呈狭窄的罐状,盘壁到底部时变薄。器物底部有植物形状装饰物,似乎是在模仿菊花或牡丹花的形状(哈吉耶夫、智贤:2012年,第56页,图1)。另一个出土文物是一个几乎半球形的器皿,有圆形的内壁和一个椭圆形底盘。底盘边缘呈波浪形,这是这种青瓷的特点。盘子的表面同样覆盖着特有的浅灰绿色优质玻璃釉。容器壁沿边缘方向逐渐变薄(图2)。这个器皿也是根据模型制作的,内外都有从底部延伸到边缘的纹路雕刻(刻有勺子形状的装饰),器壁呈轻微波纹状。瓷盘由两部分组成:盘子本身和与之配套的罗盘,盘底中央有一个圆孔,圆孔上刻有一个六瓣花环。单独制作的罗盘,其釉色也与瓷盘略有不同,呈青绿色(哈吉耶夫、智贤:2012年,第56-57页,图2)。盘子装饰有一朵菱花,菱花六个尖尖的花瓣在盘面栩栩如生。这种花是中国和韩国装饰艺术中最受欢迎的图案,同样受欢迎的还有莲花、菊花和牡丹。菱花和莲花一样,具有护身符的功能,同时作为八卦中“阴”的象征,根据古代的信仰它可以缓解火的影响(哈吉耶夫、智贤:2012年,第57页)。此外,牡丹、荷花、菊花和梅花还代表着四季,牡丹象征春天,荷花象征夏天,菊花象征秋天,梅花象征冬天(田和:2011年,第176页)。同时牡丹也是中国古代财富和高贵的象征,莲花则是精神纯洁的象征(吕杰璋:2008年;帕夫洛娃:2011年)。

在本达万遗址中发现的边缘向外弯曲的盘子碎片,配有抽象的装饰图案,同样覆盖着优质的浅灰绿色釉面。但由于该碎片的尺寸较小,无法复刻装饰图案的形状(图3)。在沙马赫遗址中被发现的碗的碎片,碗身呈半球形,边缘呈扇形,同样覆盖着浅绿灰色的釉面,并配有勺子图案的装饰(图4)。沙马赫出土的另一块碎片是一个

半球形的碗,碗内壁光滑,外壁呈波纹状,碗口处逐渐变窄(图5)。

在强大的蒙古帝国的帮助下,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活动得以进一步展开(丝绸之路上的阿塞拜疆:2020年,第222页)。蒙古帝国的统治者鼓励国内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并赋予商人很高的社会地位。穆斯林商人充当中间人,为中国与近东、中东和高加索地区提供贸易联系。他们进口骆驼、马匹、地毯、药品和香料,并出口高质量的中国织物、陶瓷、漆器、生姜和肉桂。中国东南部的港口城市泉州和福州是当时中国与东方穆斯林贸易交流的重要中心。值得注意的是,这其中有一些中国陶瓷制品是专门为出口到穆斯林国家而设计的,中国的陶瓷艺术家们非常热衷于制作符合穆斯林风格的陶瓷制品(莫里斯·罗萨比,2009年)。

在后蒙古时期阿塞拜疆与中国在贸易、外交、文化等领域关系发展密切。从1403年到1433年的上半年,中国就曾七次派遣郑和下西洋。由于一系列的贸易往来使得阿塞拜疆的马匹在中国受到高度重视,这一点从皇帝对该品种马匹的渴望可以看出。“……我准备派使者去找卡拉优素福,向他要一些坚韧的战马,我听说他那儿有最好的战马……”(阿昆多娃,2016年)。

在13-15世纪,青瓷制品仍然是中国通过丝绸之路出口的重要商品之一,它们在中亚、伊朗、中东、高加索和东欧等地被大量进口(波利博亚里诺娃:2003年,第155-164页;科瓦利:2010年,第135页)。

在格里赫奇拉格、沙布兰和占贾的中世纪遗址中,在阿布申伦比尔贾赫村附近的港口均发现了14到16世纪的青瓷。在格里赫奇拉格遗址中出土的盘子碎片同样为典型的青瓷器皿。厚实的盘壁底部配有蔬菜形状的装饰物。另一个盘子的底部中央有一个花纹装饰,而盘子外壁上则有一个漏斗状的装饰,花纹装饰部分描绘的是某种植物的花和叶。

在阿尔达比勒，伊斯兰教教长的综合博物馆里有大量的青瓷餐具收藏品(波普:1956年)。这一时期的青瓷餐具，有一个普遍的特点就是餐具内里有釉面，而椭圆形盘底和盘底内侧的红色或棕色部分则是不上釉的。人们认为这是“青瓷釉在烧制过程中分离出氧化铁的结果”(科瓦利:2010年，第135页)。正因如此，来自阿尔达比勒，伊斯兰教教长综合博物馆里的文物和来自比尔贾赫村港口附近的瓷器制品得到了外界广泛的关注。那是一个形体厚重的瓷盘，有一个圆形的凹槽，是来自比尔贾赫附近港口的青瓷制品，上面装饰着几何植物。盘子上有浅灰绿色的釉面(图6)。植物茎上有釉，底部无釉，有淡红色碎片。

来自阿尔达比勒伊斯兰教教长综合博物馆的厚壁深盘，其内壁上装饰有几何和植物图案：凹槽、条纹、弯曲的植物根茎、荷叶和花朵。盘子上覆盖着浅灰绿色的釉面。茎上有釉，底部有一个无釉的圆环，有淡红色的碎片(波普:1956年，第29631号)。在另一个深盘的中央，用榫卯技术雕刻了一棵带果实的树，盘面上有螺旋形的卷曲装饰，边框上有吉茵的形象，在瓷盘的外部，有弯曲的茎、叶和牡丹花。盘子上覆盖着浅灰绿色的釉面。底部是无釉的环状物，有淡红色的碎片(波普:1956年，第23619号)。

阿尔达比勒的收藏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因为它其中包含了直接从中国运来的青瓷制品。萨法维王朝不仅热衷于收集中国瓷器，还曾组织过中国瓷器的生产。在阿塞拜疆南部关于中国青瓷的仿制品自13世纪以来就为人所知，在塔赫特苏莱曼的考古发掘中，就曾发现当地的伪青瓷样品(哈登, 2011年)。

根据书面资料显示，有近300名中国陶瓷工匠曾在沙赫阿巴斯统治下的萨法维帝国工作，并将他们的技能传授给当地的工匠。在这群工匠之中不得不提到一位叫作贾汉吉尔(1605-1627)的

陶艺大师的故事，他不幸打碎了一件皇室收藏制作于明朝初期的珍贵青瓷器。所以“他被命令去中国，以便修复这件作品。但在两年的时间里，他没有找到任何可与之相比的东西，就在他打算放弃时，他的职业生涯却因一次愉快的意外而得以挽救，在萨法维的一家工厂里制造了一个复制品……”(阿昆多娃, 2016年)。

青瓷不仅通过陆上贸易路线运送，而且似乎更多的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运送。马达班尼这个名字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海路是青瓷运往穆斯林近东，包括阿塞拜疆的主要途径。在中世纪，这条路线被称为“陶瓷之路”或“烟斗之路”并非巧合，这些名称清楚地反映了主要的进口货物，它们大多是瓷器、青瓷和雕有龙、莲花等装饰的烟斗(哈吉耶夫、智贤:2012年，第58页)。然而，海上贸易的痕迹比陆地贸易要少得多。在这方面，20世纪70年代的水下考古发掘中有关14世纪元朝时期沉没在朝鲜半岛西南海岸的一艘中国沉船的研究极为有趣，“打捞出20664件陶器、729件金属物品、43件石器、28吨中国钱币、1017块红檀木板(约1-2米长)和另外1346件物品(包括家用物品)”(奥科罗科夫、马迪科娃:2020年，第75页)。其中陶瓷器主要以青瓷为代表。

因此，考古证据表明，大量高品质的陶瓷，青瓷制品，在当时具有很高的价值，是财富和权力的标志。它们通过丝绸之路从中国被运往阿塞拜疆市场。值得注意的是，在丝绸之路沿线的中世纪城镇文化研究中同样记录了有关中国青瓷的发现过程。◆

### 参考文献:

1. Azerbaijan on the Silk Road. (Edited by S.Mustafayev). Baku: "Tahsi", 2020, 344 p.
2. Haddon R. A.W. Fourteenth century fine glazed wares produced in the Iranian world, and comparisons with contem-

- porary ones from the Golden Horde and Mamlūk Syria/Egypt. PhD Thesis. London, 2011.
3. Keally Ch.T., Taniguchi Y., Kuzmin Y.V., Shewkomud I.Y. Chronology of the beginning of pottery manufacture in East Asia // *Radiocarbon*. 2004. V. 46. P. 345–351.
  4. Jenuns S. The Chinese Porcelains in Topkapı Saray, Istanbul //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Transactions.*, vol. 36, London. 1967,
  5. Pope J.A. Chinese porcelains from the Ardebil Shrine.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Freer Gallery of Art. Pope: 1956, 194 p.
  6. Richthofen F. von. China . Berlin : R. Oppenheim, v.1, 1875. – 425 S.
  7. Абилова Г.А. О находках селадона в Азербайджане // *Труды Музея истории Азербайджана*. Т.1. Баку, 1956, сс. 56-60
  8. Азербайджан на Шелковом пути. (Под редакции акад. Ш.М.Мустафаева). Баку: Изд-во “Təhsil”, 2020, 384 с.
  9. Ахундова Н.Ф. Об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соприкосновениях Азербайджанской и Китайской культур: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Баку: ИПО Турхан, 2016.- 81
  10. Бируни, Абу Рейхан. Собрание сведений для познания драгоценностей (Минералогия). Пер. А. М. Беленицкого. Ленинград: Изд. АН СССР, 1963.
  11. Гаджиев М.С., Лим Джихен. 2012. Находки селадона в Дербенте и проблема ег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и путей поступления на Кавказ и в Восточную Европу // *Вестник Дагестанского Научного Центра*, №4, сс. 55-59
  12. Кверфельд Э.К. Фарфор. Ленинград: Гос. Эрмитаж, 1940, 80 с.
  13. Коваль В.Ю. Керамика Востока на Руси IX-XVII века.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2010.
  14. Окорочков А. В., Мадикова Л. В.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подводного культурного наследия. Москва: Институт Наследия, 2020. — 516 с.
  15. Моррис Россаби. Золотой век империи монголов. Москва: Евразия, 2009, 479 с.
  16. Павлова И.К. История куль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средневековья. Учебное пособие.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СПбГТУРП, 2011, 122 с.
  17. Полубояринова М.Д. Китайский селадон из Болгара // *Российская Археология*, 2003, № 2, сс. 155-164.
  18. Люй Цзечжан. Композиционны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живописи на фарфоре Китая. Автореф. дисс. канд. искусствоведения.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2008, 23 с.
  19. Тянь Хэ. Семантика традиционного китайского орнамента // *Общество. Среда. Развитие. (Terra Humana)*. 2011, № 1, Москва: сс. 173-178.
  20. Цетлин Ю.Б., Петрова Н.Ю. Ближний и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общее и особенное двух центров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я гончарства // *Российская археология*, 2020, №1, с.32-43.
  21. <http://www.history-illustrated.ru>
  22. <http://www.synologia.ru>
  23. <http://www.zhengongfu.org/kultura/keramika/magiya-keramiki-qinqi>
  24. <http://artyx.ru/books;>